

「五四」前新潮社的 核心關懷（一）：民主

在五四事件發生以前，歷來學者的研究，多把新潮社社員的言論主張，視為為呼應胡適、陳獨秀等《新青年》作者群所談的主題所發。且大部分的研究，也僅將這些主張，用文學改革跟批判傳統禮教這兩大路線來統稱。⁰¹ 雖看似沒有太大疑問，然而在這種論述基調裡，會衍生兩個須再深思的問題。第一，是新潮社的主張，真是僅為呼應胡適、陳獨秀等人在新文化運動裡的想法而作嗎？⁰² 第二，新潮社社員在當時「五四」前的

-
- 01 許多早期研究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通論著作或是史料彙編，多持類似的看法。以周策縱的觀點為例，他認為這批新潮社的成員主要「受《新青年》教授們的啟發，並把這場運動看作是『思想革命』或『社會革命』」，而多數學者在研究上，都持和周策縱一樣的論述。參見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75。
- 02 例如胡適，他在民初社會上所佔有的地位，可用當時人說他暴得大名的稱號來形容，歷來中外許多學者都會針對他暴得大名的詳細內容，作各

言論，關於文學改革及批判傳統禮教，究竟涵蓋面有哪些，且是否有涉及別的議題？

筆者以為，新潮社的言論，的確有響應到《新青年》作者群所提出的文學改革和批判傳統禮教兩大議題。只是，他們在這真正想表達的，更是這兩大議題背後所代表的民主與科學精神。⁰³而從「五四」前新潮社社員的言論來看，他們在提倡民主與科學精神上，有其特殊的詮釋方式。而他們的言論，也絕非一味照本宣科式的抄襲《新青年》的說法。因此，值得深入來作探討。

至於新潮社在「五四」以前提倡的各種主張與理念，部分社員雖會將他們的意見發表在其他報刊中（請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但最能完整呈現社團主張的地方仍屬《新潮》雜誌。為此，在本章和第五章裡，筆者將會把這些意見，運用民主與

方面深入的探討。而像沈松僑先生的研究裡，更曾對於胡適在民初社會上的各方面影響，做了詳盡的介紹。沈松僑，〈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載於周策縱等著，《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1991年），頁131-168。

03 就像陳獨秀在此一時期所述「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一樣，新潮社社員之所以響應新派人士所提出的議題，主要就是認同其背後反映出的民主與科學精神。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6卷1號（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影印），1919年1月，頁10-11。

科學的脈絡加以整理及分類，從中並可瞭解新潮社正式投身新文化運動後，他們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內涵有哪些影響。⁰⁴

只是，在此需先特別聲明，當時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認知，與現今我們對民主與科學藉定範圍差異甚大。從他們的觀點來看，民主與科學所能及的領域是相當廣闊的，這和我們目前對符合民主與科學精神的領域，有更明確且專門區隔的知不同。因此，在本章與第五章中，筆者是用當時新潮社他們對各事物的理解，透過當時人的眼光與角度，來看他們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究竟包含哪些面向？

而本章要論述的主題，則為「五四」以前，該社在如何落實新文化運動中民主精神上，所提出的觀點。在筆者的看法中，新潮社所認定的民主精神，重點是自由和開放。他們對自由和開放的嚮往，反映在對政治、社會、乃至於文學革命議題的討論。下面將分別加以介紹。

04 民主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最早從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被提倡。初期是與民本思想相結合，後來陸續和大同思想、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相結合，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更和科學互相呼應，成為新派人士最重視的兩個內涵。這個部分，可參見黃克武先生的研究。黃克武，〈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義與淵源〉，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384-397。

第一節 民主精神與政治

「五四」以前，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人士，為了讓自己的言論能夠保持他們所希望的「中立」色彩，所以對於政治話題，似乎都刻意保持距離。特別是在當時為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的《新青年》編輯群，他們的雜誌內容更明確標榜「不談政治」。⁰⁵雖《新青年》內部在1918年下旬至1919年初時，曾為了是否該在雜誌裡參有政治議題的文章，起過一番爭論，但最終仍決定要維持住《新青年》既有不帶政治立場的風格，使「五四」以前的《新青年》，內容上仍可看出該刊極力避免帶有政治色彩的痕跡。而一部分熱衷政論的《新青年》編輯群，另於1918年12月22日發起《每週評論》，作為這批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談論政治的專屬刊物。⁰⁶

因這種影響，使得受《新青年》啟發所成立的新潮社，在當時外界的觀感，乃至現階段新潮社的研究，多普遍認定新潮社的言論主張不牽扯時政。⁰⁷其實，新潮社社員對政治也有著

0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二）（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頁41。

0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二），頁41。

07 甚至在早期受兩岸政治氛圍所影響的大陸研究中，還幾乎都會言新潮社成員的言論，是用資本主義改良派的立場來避談時政。張允侯，《五四時期的社團》（二）（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頁44-45。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

很大的關懷，只是他們較不直接採用激烈的言論來談這方面的議題。

此外，新潮社社員對於當時政治的關注，著眼點通常又採宏觀的方式。即他們所談的政治議題，是站在政治思想或某種政治風氣這種大的面向來討論，而較少評論每日更新的政治新聞。所以，政治議題的討論，在後人看來就相對的不明顯。

然而，新潮社社員所討論的政治議題，仍能直接點出當時中國政治上產生的亂象。從他們當時對政治上的討論來看，更可看出當中所反映出的民主眼光。

由當時新潮社社員最關注的政治焦點來看，首推反對中國當時各地軍閥的擁兵自重現象。

此一議題，大約在1918年下半年開始就陸續有人在討論了。到了1918年11月一次大戰宣告結束後，由於中國國內的普遍是沉浸在戰勝國的喜悅當中，⁰⁸加上國際間瀰漫停戰與和

期刊介紹》（二），頁76-77。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25-227。

08 關於一次大戰的終結，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於戰爭勝利，普遍的心情都是很愉悅的。就舉新文化運動支持群來說，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對於協約國成為一次大戰的勝方是充滿喜悅之情的，所以在《新青年》5卷5號中，就刊出李大釗、陶孟和、蔡元培1918年11月在北京中央公園慶祝歐戰勝利的演講內容，而這些演講內容，都充滿著一種歡愉的氣氛。見〈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新青年》5卷5號，1918年11月，頁436-441。另外，由《新青年》部分編輯群另創談論時政為主的《每週評論》，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就稱「德國倚仗著他的學問好、兵力強，

平之氣氛，更讓此時中國國內的多數人士，藉此時機用輿論發出中國國內「裁兵」、「減軍」、「南北議和」等聲音。⁰⁹ 新潮社成立後，針對這部分的政治議題，他們也多持贊成的態度，並加入此一議題的討論。其中，新潮社社員最早談論此一問題的人，首推傅斯年。

一、傅斯年的〈去兵〉論

1919年1月《新潮》的創刊號中，傅斯年率先響應此議題而發表了〈去兵〉一文。此文原是1918年11月底北京大學在中央公園舉辦開放演說會時，他想要說的演講內容，後他把這構思寫成此文。¹⁰

專門侵害各國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的大敗，稍微懂得點點公理的協約國，居然打勝了。這就叫做『公理戰勝強權』，語氣中儼然反映了這些知識份子是以戰勝者的地位自居，並且有一吐中國長年被西方國家侵略的怨氣之意味。〈每週評論發刊詞〉，《每週評論》第1號，1918年12月22日，第1版。

09 如當時的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就曾用隻眼的筆名，發表過〈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一文，提出「對內的覺悟及要求，是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用兵力侵略土地鎮壓人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縱然不說大同主義，不說弭兵主義，照德國戰敗的情形看起來，就算將來戰爭仍不能免，也不是軍國主義軍閥執政的國家能得最終勝利的了」的說法，趁此時機發出裁兵和終止內戰的聲音。隻眼，〈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每週評論》第2號，1918年12月29日，第1版—第2版，【社論】。

10 當時傅斯年本來想要在臺上發表此一議題的演說，但因同日有位王撫五先生，在他之前先以「弭兵」為題發表演講，所以他後來就沒有上臺演說。見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臺北：東方文化書局，

這篇文章中，傅斯年對於當時中國各地都在大量徵兵，給了完全負面的評價。文章中首先指出「兵是沒用的，兵是代表獸性的，兵是野蠻時代的遺跡（Survival），兵是現代社會上一切罪惡的根源，兵是文明進化的最大障礙物」，¹¹ 同時，他用所謂進化的觀點，認為兵是訴諸武力，而武力主義代表著過去的黑暗，未來的光明是要講求民主主義，所以兵不符合時代的趨勢。¹² 此外，他也進一步說明兵在當時悖離了政治、社會、教育的新潮流。他在文中還把兵所有的壞處，分成「兵是破壞的」、「兵是不生產的」、「兵是不負責任的」、「兵是無權力的」、「兵是幼稚的」與「兵是以不道德為道德的」這六條，但傅不討厭所有的兵，相反的他同情那些當兵的人。他甚至認為那些當兵的人本性都是善的，只是可憐被政客或軍閥利用而為惡。因此，他在文中做了這樣的呼籲：

我還要告訴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負罪惡責任的人說，兵是根本沒用的。若是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夠以力服人，果然能夠達到他的政略，袁世凱早做了中國的皇帝、威痕侯罕者蘭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倆現在到那裏去了？他的政策那裏去了？那不如袁世凱百分之一的人，還在那裏做武力成

1972年，再版景印本），1919年1月，頁25。

11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25。

12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26。

功的夢裏！……兵不僅沒有用處，並且有負號的用處。用兵滅人家，到後來為人滅；用兵得地步，到後來失地步。……兵從古以來的負號用處，人民的福利，國內物質的發達，那黷武的人縱然不曉得，他自己福利總要想想哪！這負號的用處可不可怕哪！¹³

在提醒軍閥跟政客認清兵不是萬靈丹後，傅斯年開始針對替兵辯護的人，提出更強烈的質疑，並藉此重申中國廢兵的勢在必行。

首先，傅斯年反對替兵制辯護者形容傳統兵，具有勇敢、刻苦等良好形象化身，因而不該把兵廢除的說法。他認為這種說詞，不過是「拿過往的事跡，作為將來應當繼續的保障，是件極傻的事。這種人真忘了進化的道理，是在於推陳出新了」，又說這些形象也不是只有兵才獨具，當時早有別的替代方案，最適合的替代方案就是「勞働者」跟「工本主義」。為此他還強調「未來的奮鬥，應當是人和自然界鬥，用人的能力戰勝自然界，開拓殖民地、新領土，不向別人身上開拓殖民地、新領土，同是一種奮鬥，兵用來是破壞力，工本主義用來便是建設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為定理了」。¹⁴

其次，傅斯年認為當時中國已經到了該廢兵的時候，而且

13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頁28-31。

14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頁31-32。

他認為廢兵是一股世界潮流。尤其此時正值一戰結束，他看到參與歐戰的國家正在開和議，有些限制武備、組織國際法庭的提案都開始在討論，因此他覺得世界廢兵的趨勢已開始萌芽，並且樂觀的認為「世界廢兵的日子近了」。¹⁵

最後，對於有人認為當時中國很多內憂外患，所以去兵就可能造成國家危害的看法，傅斯年發出最猛烈的批評。他覺得中國當時的內憂，根本原因就是兵，對此他特別強調「中國土匪多，但中國土匪全是兵變的，沒兵就沒土匪了。說中國叛亂多，但這也是兵激的，稱叛的人也是挾兵力的。……中國兵不特不能除內憂，並且是一切內憂的根原，除了兵就除了內憂的根原了」。至於防止外患，他更認為用不到兵，他先指出中國的兵從來不是為了抵擋外敵而設，所以說：「難道中國的兵為打外人而設嗎？他也曾經打過外人嗎？要是中國指望著兵保護，中國地圖早變成七色八色了」。¹⁶

另外，傅斯年還提出一個觀念，即保衛國家不是取決於兵員的多寡，更重要的一環是在於外交手腕，並懂得利用國際上強國間相互角力的均勢。為此，他說：

中國以前的生命，全靠著均勢，以後的生命，也要靠著均勢；再加上強國對於弱國的同情，經濟上的關係。中國不會旦

15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頁32。

16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頁32-33。

夕就亡的，有兵沒兵，多少都是一個樣。我們又何苦耗費無量的金錢，造就有害的兵來？別國對於去兵，都有相互牽制的形勢，……中國卻不受這種牽制。他們不去，我們卻可以獨自去掉他；正因為中國兵隊，對外國的生命，沒有絲毫的關係。¹⁷

在反覆論證兵在防止內憂外患上都毫無功用後，傅斯年提醒當時中國政府，應趕上未來世界將走向廢兵的潮流，甚至可帶頭作第一個完全廢兵的國家。他言「我們既處在去兵的絕好機會，何不登時起來為天下先？這樣一辦，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覺得中國人有真精神。有同情心，有這敬心，中國的生命，真穩固了。機會！機會！不可失了」，更於文末再次呼籲民眾，應該一起向政府請願，迫使政府正視這個問題，言「這樣不愁他不聽，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國不當世界去兵的領袖，不愁中國不替世界造個國慶日。機會！機會！不可失了！我們預備罷」。¹⁸

從此文的內容中，可看出傅斯年的立場是支持裁兵論的，且他更是唯一直接把去兵和民主精神相連的新潮社社員。只是，他又更進一步提出完全廢兵的看法。這種論調，倒是在當時裁兵輿論中最大膽且激進的說法，使得一些主張與傅相近的人士（贊同解決國內軍閥林立問題的人）不能認同，後來回頭

17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頁33。

18 傅斯年，〈去兵〉，《新潮》1卷1號，頁33-34。

反指傅斯年的想法似乎有些衝動，說中國若完全沒有武力，才會導致國內的大亂。¹⁹

二、其他社員對兵的討論

在傅斯年之外，「五四」前的《新潮》1卷1號至5號，也有其他社員就兵帶來的社會亂象加以批評。但不像傅這樣直陳，他們多用兼論的方式來談此問題，或把兵所造成的危害，用小說或以新詩的形式隱喻其中。

例如，另一位《新潮》雜誌編輯要角羅家倫，在《新潮》創刊號上發表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裡，就更深一層的描繪了大量徵兵可能帶起的中國動亂危機。

羅在文中提及1918年10月的俄國革命，他認為此革命會是二十世紀世界的新潮流，尤其在當時東西交流越來越頻繁的情況下，他認為中國一定會被「世界的新潮流捲去」。²⁰但他擔心當時中國社會，還不夠像西方強國般成熟，若俄國式的革命方式傳到中國，更會造成國家更為動盪。他拿了歐洲的德奧兩國的社會，與當時的中國社會作比對，認為「潮流傳入德奧國

19 例如，當時也屬支持新文化運動理念的留日學生易君左（1899-1972），就指稱傅斯年的陳意雖高，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是無法實行的，並言現實世界中，會有強國持侵略中國野心的意圖，所以還是要防範未然，並且只能做到「限制軍隊，改良軍隊」的地步。君左，〈兵果能去嗎？〉，《晨報》，1919年3月12日—3月13日，第7版，【自由論壇】。

20 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1卷1號，頁22。

內，尚無十分危險，因為德奧人民，大多受過教育；兵工兩界，也都是有常識的」，但中國不一樣，因「中國的普通人民，一點智識沒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但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模做起來，中國豈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嗎？」。²¹ 藉由這種暗喻，指出中國當時政治上與歐洲的差異性，在於有許多軍閥或政客利用徵軍人來爭權，而兵也成了當時中國社會動盪不安的主因。只是，羅家倫此文的主軸，是放在對於中國要趕上俄國革命這個世界新趨勢的看法，至於徵兵或是軍人所造成的各種問題，他在此就沒有進一步的著墨。

而在小說和詩歌創作上影射到兵禍問題者，則首見非社員的歐陽予倩（中國現代劇作家，1889-1962）在《新潮》的創作。

在《新潮》1卷2號中，刊登了歐陽予倩寫的小說〈斷手〉，裡面對於兵所造成的生命危害，有著赤裸裸的描述。小說中藉由主角陳母與子阿貴之口，道出中國當時軍人如何姦淫擄掠、無惡不作，並用陳家一家（包括狗）都相繼慘死的結局，來影射現實生活中兵帶來的戰亂是踐踏人命、使百姓生命沒保障的最大元兇。最後，阿貴背上發現的「斷手」，赫然是自己妻子的手，且隱約在耳邊聽到妻子淒慘的聲音說「我的丈夫啊！只因為一隻手鐲取不下來，纔被……」，²² 點出當時中國兵如土匪般無惡不作，甚至會為了搶奪錢財而濫殺無辜。

21 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1卷1號，頁22。

22 歐陽予倩，〈斷手〉，《新潮》1卷2號，頁275-277。

由於歐陽予倩寫的這篇小說在《新潮》刊出後，獲得了不小的迴響及好評，所以後來《新青年》、《晨報》、《每週評論》等報刊中都有陸續轉載。²³ 另外，在《新潮》1卷4號裡，社員楊振聲也發表了短篇小說〈一個兵的家〉。該小說從一個小兵的家說起，藉此說明兵原本也是由一般民眾而來，只是在政客、軍閥為一己之私的徵兵過程下，這些兵成為戰亂時代的代罪羔羊和犧牲品。

小說裡這個家中唯一維持生計的爸爸被徵去當兵打仗死了，留下年邁的老父、妻子和三個兒女靠乞討過活。這一家人悲慘的情景，對照文末高級軍官坐著大汽車從路上呼嘯而過的畫面，並突顯每個軍閥都不管老百姓的生死，只一再透過戰爭與徵兵，來鞏固自己的勢力。²⁴

除上述兩篇小說外，還有一些白話詩，也帶有嘲諷兵形象的意涵。諸如顧頡剛以顧誠吾之名在1卷4號的〈雜詩兩首〉、²⁵ 周作人以筆名仲密在1卷5號的〈京奉車中〉，²⁶ 筆觸中都有這類暗指兵造成社會問題的意味。

除徵兵問題外，尚有部分政治話題也引起過新潮社社員的

23 有關文章被轉載的資料統計，可參見李惠惠的整理。李惠惠，《新潮雜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340-341，【附表】。

24 楊振聲，〈一個兵的家〉，《新潮》1卷4號，頁583-585。

25 顧誠吾，〈雜詩兩首〉，《新潮》1卷4號，581-582。

26 仲密（周作人），〈京奉車中〉，《新潮》1卷5號，頁783。

興趣，只是討論並不像徵兵問題般來的深入與廣泛。例如，在1919年3月1日，韓國的「三一運動」爆發，此事件是當時韓國為抵抗日本統治，所發起的大規模獨立抗爭事件。此事發生後，立刻引起當時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因此，新潮社也曾對這個國際要聞作了一些評論。

在1卷4號的《新潮》中，傅斯年就轉載其稍早傅斯年在1919年3月20日的《晨報》上發表的〈朝鮮獨立運動中之新教訓〉一文。他在文章中說雖這次獨立運動在外表上以失敗收場，但就內在而言，是「開革命界之新紀元」，且給這運動的特色與成果，下了「非武器的革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革命」及「單純的學生革命」這三個註腳。²⁷而另一位社員陳兆疇，也在同期的《新潮》，以穗庭之名寫了〈朝鮮獨立運動感言〉一文，說這類的民族獨立運動，是世界和平的永久基礎，且當時中國的南北政府更應藉此事件，為中國未來的和平謀福利。²⁸直接評論時政的做法，更可看出新潮社社員對政治上的關心。不過，這條國際要聞，在後面的《新潮》中就沒有再多做討論了。

綜觀「五四」以前的新潮社，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其實就已經有了，只是他們採取的態度較不激進。整體來說，潮社對於政治議題，則多採取一種比較委婉的方式來表達。不是以小說

27 傅斯年，〈朝鮮獨立運動之新教訓〉，《新潮》1卷4號，687-688。

28 穗庭，〈朝鮮獨立運動感言〉，《新潮》1卷4號，頁688-689。

和新詩的方式將政治批評隱喻其中，就是把政治議題和當時一些新思潮接合起來加以做專文探討。但不論何種形式，這些文章都反映出新潮社社員對於很留意政治議題的。這與同時期嚴守不談政治的《新青年》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若以羅家倫後來的回憶所言「新潮社的政治彩色不濃，可是我們堅決主張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們主張我們的民族獨立和自決」來看，²⁹除可知新潮社不會避談政治，更可瞭解到新潮社在切入與政治有關的議題討論時，是以民主思維作為前提。就此來看，這可稱作該社試圖在政治議題上所作的民主實踐。

第二節 民主精神與社會

一、《新青年》編輯群論民主與社會的歷程

新文化運動的內涵，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反當時中國的傳統思想，藉由去傳統來達到建立新價值觀的目標。³⁰不過，所謂的傳統思想，長期下來以演變成一般民眾都深信不疑的社會規

29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頁64。

30 筆者在此引用了王汎森的論點，王汎森認為新文化運動本身帶有「破」或「立」兩種精神。見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241。

範，因此，如何去改變當時社會裡各種根深蒂固的現象，就成為新文化運動裡重要的議題。以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編輯群來說，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批判，他們側重的層面，是放在此時已被扭曲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此時被扭曲的原因，則跟中國從清末以後的政治局勢發展有直接關聯。從甲午戰爭以降，中國思想界已開始了新舊主流之爭，主流思潮最後又得以政治相結合，並能交互作為憑依。³¹

至辛亥革命成功，於1912年1月建立了嶄新的民主共和體制國家後，新政府隨即公佈了很多符合當時西方潮流的新政策，特別是當時擔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於同年月宣佈停止祭孔、中小學廢止讀經的公告，象徵了長期以來被視為舊派圭臬

31 甲午戰爭以後的知識份子，為求變法圖強，因此希望在採用思想上引進西方學理，以這些思想來達成政治改革的目標。然而這種想法卻使傳統價值觀產生危機感，因此讓新舊兩種不同的思想展開一連串的對抗，那派思想能跟當時政治局勢相結合，就能取得當時的思想主流地位。余英時先生即從這個層面著手，針對戊戌變法以後思想界激進跟保守主義的發展，作出完整的分析。見余英時，〈再論中國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華先生〉，《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1995年），頁198-206。此外，萬麗鵬在其著中也作了類似的探討。見萬麗鵬，〈從胡適論社會主義看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抉擇〉，載於呂芳上、張哲郎主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9年），頁423-435。而有關新舊思想在清末以後的主流地位之爭演變，王汎森先生則在其著作中有完整的介紹。見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244-250。

的儒家思想，已正式被清末以來所發展出的新文化取代其思想主流地位。³²

然1912年4月，袁世凱（1859-1916）接下臨時大總統後，新思想的推廣與發展即失去了依靠。在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1912.4-1915.12），他的執政成為了舊文化回歸主流思想地位的政治靠山，更給傳統儒家思想有了再起的機會。³³

到了袁世凱為稱帝所發起的帝制運動期間，當時的國會更趁勢定出孔教為國教的憲法條文，更讓舊文化的主流思想地位達到了頂峰。儒家文化至此已變成了統治者在政治上的一種工具，加上提倡孔教者清一色的都是軍閥，使得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舊文化，跟「軍閥」、「獨裁」、「帝制」這些與民國建立精神相違背的政治形象畫上等號。簡言之，即儒家跟當時的統治者結合而被「政治標籤化」，使得外界對這時的儒家言論產生惡劣印象。³⁴而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思維，也因此可藉著

32 周作人在其回憶中就曾指出這些政府頒布的新公告的重要性，他並認為停止祭孔、中小學廢止讀經這兩件事「在中國的影響極大，是絕不可估計得太低的」。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蘭州：敦煌文藝，1998年），頁222。

33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全國各地又開始提倡尊孔讀經的言論，不少祭祀孔子的組織和活動又紛紛出現，且袁世凱本人還親自帶頭從事這場復古運動。而以上社會思想主流及政治局勢的發展，皆參考了王汎森先生其著作中的分析。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245-246。

34 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249。

批判儒家體系的社會結構來呈現。

以身為新文化運動主幹的《新青年》編輯群為例，他們當時是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對當時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由陳獨秀這位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他為《青年雜誌》（於第2卷開始正式更名為《新青年》）的所寫的發刊詞中，正可反映出這批知識份子，對於代表了儒家思想體系的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所抱持的態度：

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與之所忍言者。彼陳腐朽敗之份子，一聽其天然之淘汰，雅不願以如流之歲月，與之說短道長，希冀其脫胎換骨也。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以為隣，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³⁵

陳獨秀在這篇發刊詞中，雖未直言什麼是「陳腐朽敗」的人與社會價值觀，但很明顯是針對在社會上具有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而來，這正代表了提倡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與《新青年》的編輯群，他們反對儒家體系所建立出的社會價值觀。因此，對於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批判，成為了《新青年》所收錄內

35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卷1號，1915年9月，頁1。

容的一大主體。

我們可看到在1915年末到1918年底這三年間，《新青年》編輯群對儒家體系所建立出的社會制度，展開毫不留情的抨擊。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誌》中開始碰觸到儒家思想為主體而產生的中國傳統社會問題，不過當時他批判傳統社會的說法還較為籠統，多是站在救亡圖存的角度，來說舊社會體系是造成國家積弱不振主因。因此，這期間不論是他在探討國家對外抵抗力薄弱時所提的「學說之危害」，³⁶或是他在比較東西方民族性問題時所探討到的中國宗法社會制度結構的問題時，³⁷都是採比較委婉的態度作論述。

1916年開始，這批知識份子逐漸將傳統的抨擊具體化，直接點明儒家思想是中國社會及國力長期積弱不振的本因。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指出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三綱」，其本質只是社會上各階級的不平等現象合理化，這並違背了當時以共和為國體的民國政權理念。³⁸此外，不論是在

36 陳獨秀，〈抵抗力〉，《青年雜誌》1卷3號，1915年11月15日，頁1-5。

37 陳獨秀談到東方民族性的特質時，他以傳統中國為代表，說「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也就是宗法社會。但他認為宗法社會「然律以今日文明」，是會產生惡果的。他對這些惡果雖有強烈的批評，但並未明言這些制度的產生，是要歸咎於儒家思想。見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青年雜誌》1卷4號，1915年12月15日，頁1-2。

38 陳獨秀直言「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已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而此時中國採用的「共和立憲制，

抨擊極端尊孔的康有為（1858-1927）所用之「帝制根本思想」、「強詞奪理，率膚淺無常識，識者皆目笑存之」的辭彙；³⁹ 批判孔子學說放在憲法裡成為明文規範這種構想時所說「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或是將孔子思想不能適用現代社會所歸結出「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的說法，⁴⁰ 所談論的內容跟批判強度跟 1915 年相比，更直接鎖定了儒家思想是中國社會積弱不振的主因。

除陳獨秀外，1916 年間，易白沙（1886-1921）於《新青年》1 卷 6 號至 2 卷 1 號跨卷中對孔子思想的評判，也指出孔子本身在建立學術思想體系之時就有「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變成獨夫專制」、「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藉口」、「但重作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這幾項易讓野心家得以藉機利用的弊端，⁴¹ 加上後來的

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至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見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1 卷 6 號，1916 年 2 月，頁 4。

39 康有為當時為民初中國社論裡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當時積極提倡尊孔，甚至主張把孔子當作神明在祭祀，並且發起一系列要把孔教立為國教的運動，因此在社會上引發了很大的爭議。而陳獨秀這篇文章，即是在抨擊康有為 1916 年秋投書給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及國務總理段祺瑞主張孔教入憲法的說辭。見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2 卷 2 號，1916 年 10 月，頁 21。

40 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2 卷 3 號，1916 年 11 月，頁 1-5。

41 易白沙，〈孔子平議（上）〉，《青年雜誌》1 卷 6 號，1916 年 2 月，頁 1-5。

儒家人士想藉由政治力統一學術，反而讓專制政權在統治上找到一個方便的工具，成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⁴² 讀者投稿區中，也開始有人呼應陳獨秀反儒家體系社會的想法，針對三綱五常造就的中國家庭制度，提出改革的方案。⁴³ 可看出《新青年》編輯群及其支持者，對於儒家體系社會的批判，在 1916 年已從隱諱的評論方式，逐漸把他們的批判目標明顯化。

1917 年至 1918 年底，《新青年》上對於儒家思想的批判更為強烈。除了就整體儒家思想有著毫不留情的抨擊外，各項從儒家思想發展出的社會制度，也都開始有了專門的評判。尤其當吳虞（1872-1949）這位被胡適稱作「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反傳統人士，在 1917 年加入《新青年》撰文行列後，更強化了《新青年》呈現出的反儒家社會色彩。

吳虞在 1916 年底因看到易白沙的〈孔子平議〉及其他在《新青年》上刊出反儒家思想的文章，覺得此刊物主張跟他

42 易白沙，〈孔子平議（下）〉，《新青年》2 卷 1 號，1916 年 9 月，頁 6。

43 如 1916 年 11 月，讀者李平投稿至《新青年》，他認為傳統中國社會與國家皆不良，且「家庭不良，社會國家皆不良耳」，因此，新時代的青年應該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新家庭制度。他列出許多與中國傳統家庭制度不同，並是他所想出的新家庭制度輪廓，其中，「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納之庶務，均由主婦主張」、「子女必受同等之教育」、「親不得視其子如貨物」、「成年之兄弟姊妹弗同居，財產必獨立」等概念，均不同於三綱五常為主體下的中國傳統家庭制度，而這也是正面呼應了陳獨秀在 1915-1916 年間對儒家體系的社會批判。見李平，〈新青年之家庭〉，《新青年》2 卷 3 號，1916 年 11 月，頁 6-7。

個人看法相近而主動聯繫上《新青年》主編陳獨秀。⁴⁴此後在1917年上半年，吳虞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家庭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主義本於老子論〉和〈讀荀子書後〉等數篇文章，文章中批判傳統儒家社會的言詞更為犀利。其中，吳虞提出「非孝」的看法，更讓傳統社會及家庭制度受到相當大的挑戰，並直接動搖了「三綱五常」這套儒家長期建立並主張的社會價值觀。以〈家庭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為例，他說：

蓋孝之範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其於銷弭犯上作亂之方法，惟待孝弟以收其成功。……其主張孝弟，專為君親長上所設。但求君親長上免奔亡弑奪之禍，絕不問君親長上所以奔亡弑奪之故，及保衛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權。⁴⁵

他認為儒家以孝道為本發展出三綱五常的觀念，只是為在

上位者開了專制統治方式的巧門，這種觀念也長期荼毒了一般市井小民。因此，他特別著重於抨擊與孝道有關的家族制度及專制主義，他並將這種批判焦點視為他當時自身的職志。⁴⁶

而吳虞這時期的其他文章，諸如他在〈讀荀子書後〉所稱的「吾國專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啟之，孔子教之也。……兩千年來，拘墟囿教，不能舊舍謀新。全國厭厭，困於宗法，甘為奴隸」、⁴⁷〈消極革命之老莊〉一文談到從孔子至荀子所建構的儒家「道德體系」造成中國「君臣大義，炳如星月矣。自後民賊必崇儒教，儒教必關異端」，⁴⁸及〈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中所論的「孔氏主尊卑貴賤之階級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為君尊臣卑，子尊父卑，男尊女卑，官尊民卑。……守孔教之義，故專制之威，愈衍愈烈。……恐再二千餘年，吾人尚不克享平等自由之幸福」等文，⁴⁹也都企圖推翻「宗法」、「尊卑」這儒家學者提倡的傳統社會正面形象，並拿來跟專制政權放在一起批判。這種批判方式，將反傳統的言論能夠更集中於某些層面，而這種批判效果可謂針針見血，也

44 吳虞當時曾寫信給陳獨秀，稱他自己有非儒的看法，然「同調至少」。在看到1916年間《新青年》一系列反儒家思想的文章後，稱讚「讀貴報大論，為之欣然」，並希望也能在《新青年》上暢所欲言他反儒家思想的想法。陳獨秀因此也回信給吳虞，除稱讚吳虞是「蜀中名宿」，陳獨秀也歡迎吳虞能夠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通信〉，《新青年》2卷5號，1917年1月，頁3-4。

45 吳虞，〈家庭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新青年》2卷6號，1917年2月，頁2。

46 吳虞在〈家庭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刊出後，在他自己的日記上寫下「餘之非儒及攻家族制兩種學說，今得播於天下，私願甚慰矣」的話，可見他當時把這當作他自身的畢生職志。吳虞，《吳虞日記》（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917年3月25日條，頁295。

47 吳虞，〈讀荀子書後〉，《新青年》3卷1號，1917年3月，頁2。

48 吳虞，〈消極革命之老莊〉，《新青年》3卷2號，1917年4月，頁1。

49 吳虞，〈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新青年》3卷4號，1917年6月，頁1。

讓支持傳統的人士難以招架。

至 1918 年，魯迅（1881-1936）在《新青年》上的言論，更是透過小說創作，讓反傳統言論，能藉由不同形式的批評來產生更多共鳴。

當然，在清末的文化界裡，已有人想透過文化生產工業裡的「小說」，來啟蒙當時一般社會大眾。⁵⁰而魯迅的小說創作，多少也承襲了這個理念。只是，他在小說創作中，藉由描述傳統社會制度的荒謬，表達出顛覆傳統的必須性，並將「反傳統」與「啟蒙」這兩種本質不盡相同的概念，透過小說讓這兩種概念的意義畫上等號。因此，魯迅在小說中藉由對傳統社會制度的描述，讓很多人感同身受，所以造成的影響力就更大。

筆者用他最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為例，對於儒家思想籠罩下的社會制度，所發出的沉痛批判就很令人震撼。小說中敘述一個瘋子，他認為他所處的地方是一個近似人吃人的社會。最後，甚至有這樣的描述：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

50 近期研究中，梅嘉玲就分析梁啟超以降的學界人士，在清末就有意藉著「小說」來啟蒙大眾，乃至於「教育」童蒙。她也在其研究中，以商務出版的小說，作為清末文化界要落實啟蒙大眾的範例。梅家玲，〈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梅家玲主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 81-119。

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知在飯菜裡，暗暗給我們吃。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的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⁵¹

小說中所談的「吃人」，就是在說儒家所建立的「禮教」、「綱常名教」這些中國傳統社會制度及價值觀。進而可使讀者看這篇小說時，在不斷思考的過程中，得出「中國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這種體悟及認同感。⁵²而魯迅在日後回憶這段發表小說的過往時，言他當時是抱持著「喚醒被關在鐵屋中的瀕死之人」那種心態在發表小說。⁵³所以，他寫的小說，筆觸間帶有相當深的理想及情感，較之於先前冷硬的評論文章，更易於讓反儒家及反傳統的言論，獲得一般閱眾的支援及認同。所以，周作人更稱其兄魯迅「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其重要超過於思想革命

51 魯迅，〈狂人日記〉，《新青年》4卷5號，1918年5月，頁424。並收入魯迅的《吶喊》小說集。《魯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454。

52 李歐梵先生並針對魯迅的〈狂人日記〉，分析此篇小說的結構及深層寓意。李歐梵認為藉著小說中的日記所記，可將當下的「現實」與過去的「歷史」相結合，從而瞭解到小說中所要表達出的是反傳統及中國歷史是吃人的歷史這些意涵。見李歐梵著、尹慧瑛譯，《鐵屋中的吶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頁50-51。

53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一），頁441。

了」，⁵⁴可見這篇小說在當時所帶來的影響有多重要了。

除上述幾名人士批判儒家思想最力外，其他如陶孟和（1887-1960）、周作人（1885-1967）、錢玄同（1887-1939）、胡適、李大釗、高一涵（1884-1968）、陳大齊（1886-1983）等人，在這段期間也都曾於《新青年》中，對於「非儒」、「反孔」、「反倫理」、「反綱常名教」等與反儒家思想有關的社會制度議題，作出相關的呼應。至1919年1月，陳獨秀在該期《新青年》上所發表的文章，則可視作這段時期反儒家思想人士他們的心得總結：

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⁵⁵

陳獨秀認為批判傳統社會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合乎民主與科學的社會，而這同時是這批新文化運動推行者之所以批判傳統社會制度之因。所以，從《新青年》編輯群及主要撰稿人

士，在1916年到1918年底對於社會議題的討論內容中，可看出這批發起和倡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他們的社會議題焦點是擺在批判以儒學為主體所建立的各種社會價值觀及制度上，而這部分的論述，的確對此時身為學生輩的新潮社社員產生影響。因此，新潮社社員在日後針對社會議題的討論，承接了批判儒家所建立的價值觀的概念。然而，新潮社的社員除了延續了上述的概念外，他們還深化了批判的內容，同時又對於中國社會關注又發展出一些新的議題，而新潮社討論社會問題時所產生的新走向，讓新文化運動在推動社會改革上有了更多元的發展。

二、新潮社論民主與社會上的內容

在《新青年》上發表批判儒家思想文章的人，多把焦點集中在三綱五常、宗族制度、禮教名教這些從儒學發展以來衍生出的社會制度，作為他們的批評主軸。受到《新青年》的影響，新潮社同樣支持了《新青年》作者群的立場，針對儒家思想為標準的傳統社會制度來批判，而這是一種觀念上的承接。⁵⁶

例如，新潮社成立之前，身為新潮社創社班底的學生，就

54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頁225。

55 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6卷1號，1919年1月，頁10-11。

56 筆者在此採舒衡哲先生（Vera Schwarcz）的看法，舒衡哲認為屬於師長輩的看法，影響了學生輩，並將兩代的知識份子聯起而產生共同使命。見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劉京建譯，《中國啟蒙運動：知識份子與五四遺產》，頁68-71。

有人曾親身參與了與改變傳統社會制度有關的活動。例如，創社社員中的傅斯年、羅家倫、潘家洵、康白情、吳康、潘元耿，他們當時都是校內社團進德會的會員。而加入該社團後需遵守的八項會規中的「不嫖、不娶妾」兩項基本規範，⁵⁷可跟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他們抨擊儒家思想體系下所發展出的家族制度及壓抑女性地位思想相結合。而羅家倫在1918年1月《新青年》上發表的〈青年學生〉一文，內容更呼應了《新青年》抨擊傳統社會價值觀的理念。⁵⁸

此外，我們若將《新潮》雜誌創刊時的發刊詞，與陳獨秀所撰寫的《新青年》發刊詞內容作對比，更可一目了然的看出此種承接關係：

中國社會，形質極為奇異。西人觀察者恒謂中國有群眾而無社會，又謂中國社會為兩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會，不適於今日。尋其實際，此言是矣。蓋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更有何社會真義可說。若無惡劣習俗，若干無靈性的人生規律，極枯行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謂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無領路。猶之犬羊，於己身生死、地位、意義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願為不平之鳴，兼談所以因革之方。雖學淺不

57 一共是不嫖、不賭、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吸煙、不喝酒、不吃肉這八項。此段可參見正文第二章中的介紹。

58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年），頁383-389。

足任此弘業，要不忍棄而弗論也。⁵⁹

從這段引文可看出，新潮社跟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作者群一樣，對於以儒家思想為標準的傳統社會價值觀相當反對。因此，他們也希望透過強烈批判的方式，徹底瓦解這套他們視為「惡人模型」、「思想厲鬼」的傳統社會制度。⁶⁰然而，新潮社雖在對儒家體系的傳統社會觀感上，與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作者群處在相同的反對立場。但新潮社又將這種批判的精神加以深化，特別是他們又加深批判的內容，使得儒家體系社會受到更多挑戰。下面是他們所採的兩種方法。

（一）小說創作中對民主社會的期望

受到魯迅〈狂人日記〉的小說模式的影響，「五四」以前的新潮社社員在抨擊儒家社會體系時，有不少社員會藉由文學創作的形式，將抨擊傳統的意涵參入其中。且抨擊的不是一個略顯抽象的「儒家」理念，而是具體針對儒家社會中的各項價值觀來分別批判，跟魯迅的〈狂人日記〉相比，這些文學作品似乎焦點更為明確，突顯出各種儒家主流價值觀的不對之處。筆者在此引汪敬熙的作品作為代表。

59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2。

60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3。

汪敬熙是新潮社的創始成員之一，他在《新潮》1卷1號上就開始發表文章。他在「五四」以前，總共在《新潮》雜誌上發表過5篇文章。在《新潮》雜誌的文章產量上，貢獻度雖不如同為創始社員的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等人。但值得一提的是，他5篇中僅有1篇不是小說。而他的小說裡，很多時候都呈現了出他反對當時社會中，保留的各種傳統價值觀的理念。

在創刊號中汪敬熙所發表的兩篇小說，批判傳統社會的意味就相當濃厚。〈雪夜〉描述的是北京城內的一戶窮困人家，他們在某個寒冷的下雪天所發生的故事。小說中除生動的描述了當時窮人謀生的窘境外，並且也藉由文中人物之口，點出「父尊子卑」這個從儒家發展出的社會價值觀，發展到後來變成不平等的現象。此篇小說中的主角虎兒，年僅十五六歲，就必須冒著下大雪的夜晚辛苦的在外討生活。而他的父親不負責任何家計，只會在家裡吸食鴉片，且當虎兒好不容易賺到一點錢回家時，他父親還罵虎兒賺的不夠或是虎兒在外面的開銷浪費錢。這種不負責任且擺出一副一家之長的態度，讓虎兒的母親看不下去，而說：

虎兒天天拉車掙了錢養你，你還罵他。只許你整天抽大煙；不許他喝點兒酒。你想想這三年你掙到家裡幾個大？你不給孩

子好東西吃，反教他來養你，你還今天罵，明天打呢？⁶¹

透過小說中人物之口，汪敬熙點出了父尊子卑的家庭觀念，即便在中國當時的社會底層也根深蒂固。然而，這是種扭曲的價值觀。作父親的可以在家裡頤指氣使，甚至不用負起半點責任，而讓作子女的只能忍氣吞聲，且使下一代失去了個人獨立自主的可能性。

另一篇汪敬熙在《新潮》創刊號上發表的小說〈誰使為之？〉，則是在描述他朋友的故事。文中描述了一個懷有滿腔理想的年輕人，從幼年時代就跟汪敬熙結識成為好朋友。而此人在學生時代也對自己的未來定下很高的目標，然而因家中長輩反對他一值唸書，最後迫使他放棄了原有的理想，與現實妥協導致最後英年早逝的故事。汪敬熙並在文中轉述了他朋友再見到汪敬熙時對他說的話：

唉！我到北京來作小官了，我實在不願意這樣幹，但是我父母命令我這麼樣；我妻子希望我這麼樣；我的親戚故舊也都勸我這麼樣。我不願意背父母的責望；傷夫妻的感情；和負親戚故舊的規勸。……所以只好昧著良心，拿假面目，同那麼一般人鬼混。唉！我以前的志願，現在都不提了！只對我的父母

61 汪敬熙，〈雪夜〉，《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75。

妻子盡義務罷了！⁶²

從這段轉述的話，可看出對於以儒家為本發展出來的家庭制度，汪敬熙是極力反對的，他更認為這是扼殺個人發展的主因。因此，他以「心裡忍不住的想，究竟是誰使他一生的精力都白用了呢」作為小說收尾，⁶³除了是發自內心的沉痛呼籲外，這種悲痛的心境，更點出儒家的家庭制度，是個人無法在傳統中國社會裡有所作為的根源。

在《新潮》1卷2號裡，汪敬熙也同樣發表了〈一個勤學的學生〉及〈一課〉兩篇小說。此兩篇小說所要表達的理念也與儒家有關。不過這兩篇小說與前兩篇小說不同，主旨在於諷刺提倡尊崇儒家的保守派學者，其所推崇的思想是一種過時的理念，並與現實社會所需完全脫節。〈一個勤學的學生〉是在描述一個名叫丁怡的人，他為了謀求公職而去唸書，希望藉此考上文官。他唸的教材跟科舉時代類似，還是以儒家經典為依歸，而考試制度也類似科舉，筆試都必須以八股文、引經據典為主軸。而丁怡本人求學的態度也不認真，顯示出他只是抱著短視近利的心態在求學。⁶⁴

62 汪敬熙，〈誰使為之？〉，《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03。

63 汪敬熙，〈誰使為之？〉，《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04。

64 汪敬熙，〈一個勤學的學生〉，《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245-251。

而〈一課〉的故事內容，則是在談一個鄉下學校裡，老師在上中國歷史的內容，學生完全沒興趣，只為了應付這們學業過關而渾水摸魚。而老師上課也是隨隨便便，發發舊講義給學生看。⁶⁵但這其實是將當時社會上的學校教育問題，透過小說呈現出來。而當時教育所產生的問題，其根本也源於儒家思想的獨大。⁶⁶因此，汪敬熙在《新潮》1卷2號裡所寫的這兩篇小說，除帶有濃反儒家思想色彩外，也希望以此讓民主且多元的風氣，成為社會中的常態。

除汪敬熙外，其他的新潮社社員，在「五四」以前也有用文學創作的形式，來抨擊儒家思想所造成的社會價值觀。《新潮》1卷3號以後，陸續有其他社員，藉由新詩及小說內容中描述的社會不合理現象，歸結出社會積弊已久的主因，跟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聯。筆者依「五四」以前的時間順序，將這類新潮社社員所發表的文學作品，在以下做個整理。

《新潮》1卷3號中，康白情、羅家倫、葉聖陶三位社員

65 汪敬熙，〈一課（一）〉，《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279-280。

66 在此筆者援引金耀基先生的觀點，來套用在汪敬熙其〈一課〉小說中，想表達的反儒家思想意象。在金耀基的相關研究中，他認為傳統中國的一切社會及政治制度，都帶有跟儒家思想相互連結的價值觀，他把此一現象稱作「制度化儒學」。然從19世紀末開始，「制度化儒學」的地位因西力東漸之故已逐漸動搖，他並認為至五四新文化時期，反傳統更形成一個大氣候，造成儒學獨尊的時代結束。若從他的觀察角度切入，是可以解釋當時反傳統的人為何把儒家思想當作抨擊焦點的主因。見金耀基，〈中國「現代轉向」的漫長革命〉，《中國的現代轉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0-13。

的文學創作，便與批評儒家社會制度有關。康白情的白話詩〈先生與聽差〉，以生動的語調「聽差們的手腳，就是先生們的手腳；先生們的事，就是聽差們的事」，⁶⁷ 點出了社會上仍存有的官尊民卑觀念。羅家倫的小說〈是愛情還是苦痛？〉，則是在小說中將傳統社會的家庭制度及男尊女卑這些不合理的觀念生動的刻畫出來，並透過小說中人物所言「現在的中國頑固社會裏面，還有誰娶再嫁的女子？豈不是置他於死地嗎」，⁶⁸ 來表達他對傳統社會不容許自由戀愛，以及女性地位低下的不滿。葉聖陶的小說〈這也是一個人？〉則進一步呈現儒家社會中女子地位低下的程度，文中更以「不種了田，便賣耕牛。他是一條牛——沒有自己的主兒。如今用不著了，便該賣掉他把他的身價充她丈夫的殮費，便是他最後的義務」作結尾，⁶⁹ 來諷刺這種不公平的價值觀。葉紹鈞並延續這個希望女性地位提升的觀點，在1卷5號的《新潮》裡發表另一小說〈春遊〉，持續把提振婦女地位思想隱喻在小說中。⁷⁰

（二）從批判傳統家庭制度中帶起民主社會觀

新潮社社員除以文學創作的模式，來抨擊社會現狀，在一

67 康白情，〈先生與聽差〉，《新潮》1卷3號，1919年3月，頁448。

68 羅家倫，〈是愛情還是苦痛？〉，《新潮》1卷3號，1919年3月，頁466。

69 葉紹鈞，〈這也是一個人？〉，《新潮》1卷3號，1919年3月，頁470。

70 葉紹鈞，〈春遊〉，《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879-880。

般的文章部分，新潮社社員也延續了《新青年》編輯群的路線，以直接抨擊受儒家思想所發展出的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其中，他們特別鎖定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作為他們抨擊的重點，並由此來發展論及一進步社會應要具備的民主價值。

以傅斯年在《新潮》1卷1號中所發表的〈萬惡之原（一）〉為例，這可視作新潮社社員中頗具代表性的反儒家文章。在文章開頭，傅斯年並未直接破題去討論惡的定義與根源，反而先從善的本源開始作論述。他認為善的源頭是「個性」，若社會中不允許個性存在，「不啻把這『善』一件東西根本推翻」。⁷¹ 傅斯年在這裡所稱的「個性」，就是個人主義。換言之，他認為「善」這個好的普世價值，跟個人在群體社會結構下能否自由發展息息相關。而箝制了個人發展的元素，即為文章主旨的「萬惡之原」。在此前提下，傅斯年認為當時中國的萬惡之原，來自於受儒家觀念影響所發展出的家庭制度。文中並針對中國傳統家庭制度抹殺個人發展的情況，作了詳細的描述：

可恨中國的家庭，空氣惡濁，到了一百零一度。從他孩子生下來那一天，就教訓他怎樣應時，怎樣舍己從人，怎樣做你爺娘的兒子，決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話說來，極力的摧殘個性——你看西洋有華盛頓中國沒有；西洋有達爾文中國沒

71 傅斯年，〈萬惡之原（一）〉，《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24。

有，難道中國不該有天才嗎？我說，不是沒有，是被中國家庭消滅了。⁷²

從傅斯年的觀點，可看出他當時對中國家庭制度的深惡痛絕。而他為了解釋中國家庭制度的建立導源於儒家思想，文中還引儒家經典四書中《大學》跟《孟子》所論「修身然後齊家」，及「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的內容，分別來破此二種家庭觀念的謬誤。傅斯年稱《大學》所言修身齊家的觀念「若到現在，修身的人，必不能齊家……修身必要『率性』，齊家必要『枉己』，兩者根本是不相容的」；而《孟子》所批判求富貴利達者的觀念「古時的人，或許這樣好法。現在卻應當反過來說『人若不求富貴利達，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⁷³文末，他並希望還沒有被傳統家庭觀念束縛的人「須理會得獨身主義，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業的根本」，⁷⁴點出個人人格的獨立發展，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

傅斯年的〈萬惡之原（一）〉，圍繞中國傳統家庭制度中

72 傅斯年，〈萬惡之原（一）〉，《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25。

73 傅斯年，〈萬惡之原（一）〉，《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26-127。

74 傅斯年，〈萬惡之原（一）〉，《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27。

的不合理之處，來批判儒家思維。而他反對中國家庭制度的關鍵，是認為中國家庭制度是無法容許每一個人有獨立發展的機會，而這種侷限多元性的家庭制度，就演變成傳統的中國社會制度，造成當時社會上不容有多元民主性的存在，這種關係是環環相扣的。因此，他才會再三聲明個人主義。除了為破除打破儒家體系為主的家族制度外，筆者認為，他這種呼籲更是著眼在推動民主社會上。而與傅斯年著眼點類似的社員，還有顧頡剛。

顧頡剛在《新潮》1卷2號上發表的〈對於舊家庭的感想〉一文，也同樣是從家庭切入來點出儒家社會體系產生的問題，內容則與傅斯年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此文裡顧頡剛分析中國傳統家庭制度，認為傳統家庭都帶有「名分主義」、「習俗主義」、「運命主義」這三種特色，並覺得這三種特色造成中國家庭制度最終成為一種「壞模型」。⁷⁵他於文中針對這三種特色，分別作相關的討論及批評。其中，顧頡剛批評最多的地方就在於名分觀念，他甚至點明名分觀，就是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他說：

中國的國家，本來是集合許多家庭而成的，這國家就是個『大家庭』，這君主就是個『總家父親』。那時的『君學』，

75 顧頡剛，〈對於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60-161。

最要的是『愚民』，愚了民才可以長久他的『國運』。……用安樂去騙他們的長輩，用『禮儀』去壓制他們的幼輩，所以就有了『名分』。……這『愚民』的主義經過數千年，到了周代，就應運發生了『儒家』，把名份的學說整理了一番，這古來隨便因應的法則，就有了始終本末，成了完備的系統；後世的人，更跳不出他的範圍了！⁷⁶

由此可見，顧頡剛認為受儒家所談的理念，是因專制時代統治者所需才應運而生的產物，讓中國家庭制度帶有名分主義特色。而因名分觀念的產生，造成中國傳統家庭制度出現「家長的權勢越高，卑幼愈不能獨立了」的現象，且使傳統中國社會下成長的人，會養成「沒有是非心」跟「沒有愛情」的人格。⁷⁷所以可知他的觀念中，就認定儒家的家庭制度，是專制時代的統治者為穩固政權所設計的社會制度，且這套制度還會抹殺人性善良的一面。

然而，即便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有這麼多的問題，但顧頡剛指出中國歷來的知識份子「對於家庭的情狀，抱了一個『秘密主義』，既不敢說自己的家庭，去壞他們的『面子』，又不敢

說他家的家庭，去傷自己的『陰德』」，⁷⁸最終造成中國社會無法改良，並讓男女始終無法平權，⁷⁹這是他最痛心的地方。

顧頡剛這篇文章的論點，以家庭開始向外擴展，抨擊包括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這類中國傳統社會裡視為正統規範，但不符合現代平權社會的觀念。由於此論述跟傅斯年的〈萬惡之原（一）〉觀點相近，對此傅斯年還在此文後面附上一篇稱讚顧頡剛論點的文章。⁸⁰

而在傅、顧二人先後發表這種把家庭制度不良當作反傳統社會核心的文章後，更陸續其他新潮社社員，在「五四」前呼應這種觀點。像在1卷2號的《新潮》上，第2期的新潮社成員葉紹鈞（即葉聖陶，1894-1988）寫了一篇〈女子人格問題〉，文章主軸是以提倡女性人格能獨立發展，與提振女權為焦點。而談及女性地位低落的過程中，他也提到受儒家影響的傳統家庭制度是，扼殺婦女地位的元兇。他並在形容中國家庭中的夫妻關係時，以「女子對男子一有夫妻關係，——或但有名分——就永遠不得離貳；彷彿賣給人家做奴隸一樣，只應一

76 顧頡剛，〈對於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61-162。

77 顧頡剛，〈對於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63-167。

78 顧頡剛，〈對於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67。

79 顧頡剛以比喻傳統中國下的婦女，生下來就被「不教而誅的主義」束縛住，以此形容婦女地位的低下。見顧頡剛，〈對於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67。

80 顧頡剛，〈對於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169-170。

世做奴隸到底」的語氣，⁸¹來說明這種互動關係是如何的不平等。後面他更提到「自從孔丘說了『女子與小人難為養』這句話，歷代的男子，就眾口同聲說『女子與小人難為養』」，⁸²道出孔子以降的儒家思維，是造成中國社會結構有這種不平等現象的主因。另外，此期雜誌中尚有吳康所發表的〈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一文，內容也把傳統家庭及家族制度的發展，視為阻礙中國道德得以進步的主因，他則把焦點放在傳統社會所提倡的「孝道」觀念，從談孝道觀念之非，來切入探討中國傳統家庭的問題。⁸³

《新潮》1卷4號中，社員高元所寫的〈非秘密主義〉，藉由說明「秘密」這個概念是個被有心人士所利用的價值觀，轉而來論中國社會上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都跟所謂的「秘密」有關。⁸⁴其中，他談到中國家庭中的倫常觀念時，說這觀念是種「『不許發生疑問』的秘密主義」，且以「大抵倫常主義，發生在野蠻時代」的說法，來證明倫常所倡導的忠、孝、順等價值觀都是不服時代潮流的。⁸⁵

81 葉紹鈞，〈女子人格問題〉，《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255。

82 葉紹鈞，〈女子人格問題〉，《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256。此篇並收錄至他自己的《腳步集》中。載於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主編，《葉聖陶集》（5）（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10。

83 吳康，〈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329-335。

84 高元，〈非秘密主義〉，《新潮》1卷4號，頁667。

85 高元，〈非秘密主義〉，《新潮》1卷4號，頁668-669。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跟支持新文化運動者有些芥蒂的北大學生張厚載（非新潮社社員），⁸⁶在這期的《新潮》雜誌中也發表不認同傳統家庭制度的〈獨立生活〉一文。文中他認為中國的舊家庭制度讓很多人受苦，也是社會無法進步的主因。⁸⁷所以他建議每個人應要脫離傳統家庭制度來尋求個人的生活獨立。並說「生活獨立，是達到自由必經的一條路綫」，⁸⁸提出批判傳統家庭外的積極改革做法。這位當時在新文化運動提倡者眼中的「知名」反對人士，卻在《新潮》雜誌中發表類同於新潮社的論述，可看出這段時期新潮社提倡社會民主的言論，多少擴大了反對人士對新文化運動精神的接受度。

「五四」前夕出版的最後一期《新潮》1卷5號，社員俞平伯的〈我之道德談〉，則以生物進化的眼光，來論人類的道德觀也是隨著時代在進化，因此有了新舊道德觀之分，而舊道

86 張厚載是林紓（1852-1924）的學生，也曾擔任過立場偏傳統的《神州日報》編輯，當時的身分是北大學生。他新文化運動的觀念，始終持反對的態度。曾投稿於《新青年》寫下他的反對意見。乃至於1919年3月間，他更因涉嫌在北大校內造謠說陳獨秀、胡適等在北大任教的新文化運動提倡者，已被北大除名。最後在校方調查下，於1919年3月底被北大退學。而相關的過程，可參閱胡適書信與《北京大學日刊》的紀錄。胡適，〈致錢玄同〉，載於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2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54-255。〈胡適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0日，第4版，【通信】。〈蔡校長復張鏗子君書〉，《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1日，第4版，【通信】。《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31日，【本校佈告】。

87 張厚載，〈獨立生活〉，《新潮》1卷4號，頁661。

88 張厚載，〈獨立生活〉，《新潮》1卷4號，頁661。

德觀不能容於當下社會，而他指舊道德觀念都是「偽道德」，並把儒家提倡的家庭制度及倫理觀念視為舊道德的一環，且舊道德觀不能容於當下社會。⁸⁹而文中更提出中國的新道德，必須要有「尊重個性之獨立」這一項，⁹⁰透過這個道德標準的改變，使得中國傳統的家族制度可被打破，同時也能促進社會的多元性和民主。⁹¹

同期雜誌中，社員譚鳴謙更發表了〈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談〉一文，藉破題的方式，來談民主價值對社會的重要性。且認為透過政治、經濟、精神面的民主觀養成，才能帶動社會風氣的民主，並認為這才是國家能邁向長治久安的方法。⁹²

總結當時的新潮社，在論述如何把民主觀念融入社會裡時，多運用了寫小說來呈現現實社會制度不合理之處，或批判儒家體系的中國家庭制度兩種方式，來導出整個傳統社會中的不民主。⁹³而他們也希望透過提倡男女平權、改變孝道觀、廢

除父尊子卑的家庭階級結構等具體的方法，使社會的風氣得以轉變，最後讓中國可以朝民主化的社會發展。而新潮社在社會改革的呼籲上，明顯是沿著《新青年》編輯群他們所看到的問題。然藉由較多小說創作和更聚焦的抨擊方式，在效果上或許更來的直接有力。

第三節 民主精神與文學革命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針對中國傳統文學而提出的「八不主義」改革口號，讓他在一夕間聲名大噪。⁹⁴而次期的《新青年》裡，陳獨秀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除呼應胡適的觀點外，陳更積極提出「三大主義」的觀點，來改變中國文學現狀。⁹⁵這兩人的

89 俞平伯，〈我之道德談〉，《新潮》1卷5號，頁883-889。

90 俞平伯，〈我之道德談〉，《新潮》1卷5號，頁893。

91 俞平伯在此有談到「道德的目的，原為發展人生的福利，若是不許個性的充量發揮，而僅憑社會上的習慣制裁，便每每喪失了原來的意義，反而為人生福利的阻礙了」，從文中可看出他的觀點，是想藉個人脫離家庭制度獨立發展，來促進社會的多元和民主性。俞平伯，〈我之道德談〉，《新潮》1卷5號，頁893。並載於張國嵐等編，《俞平伯全集》（二）（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478-483。

92 譚鳴謙，〈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談〉，《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頁807-821。

93 有趣的是，這時期的民主價值和精神，多會拿來和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

作連結。而這種中國式自由主義的特點，可參見黃克武先生的介紹。黃克武，〈自由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國史館館刊》復刊期30，2001年6月，頁13。

94 這著名的八不主義，即為「須言之有物」、「不摹倣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這八項。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2卷5號，1917年1月，頁1-11。

95 陳獨秀的三大主義，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寫實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名聊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三項。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2卷6號，1917年2月，頁1-4。

登高一呼，不但是文學革命的發端，同時也正式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帷幕。因此，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就成為了新文化運動中兩個主軸。

有趣的是，胡、陳二人在文學體質改革上，喊出的各項口號，其實是為落實思想革命鋪路。這種方式，就是塑造一種新的典範，來取代舊有傳統制度。⁹⁶ 而他們透過文學革命所要挑戰的傳統，包括，是主張以多元化易一元化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也就是說，從胡、陳兩人提出「八不」和「三大」的標語中，我們可以從中瞭解這些標語背後所反映的是，他們想去除單一體制絕對或獨大的狀態。而這種努力，實蘊含了民主精神。

不過，因文學革命的影響力橫跨「五四」前後，常使後來學者在研究新文化運動時，會把「五四」及「文學革命」這兩個概念，以「五四文學」的名詞來統稱並進行相關研究。⁹⁷ 加

96 這裡參照了余英時先生的研究觀點。余英時指出，胡適當年提出白話文運動的主因，實是想透過白話文學所代表的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層精英文化同等的地位，並落實思想革命。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頁28-35。

97 把五四運動跟文學革命結合的「五四文學」研究概念，約於1960年代初期產生。1961年，陳受頤的《中國文學史述》及夏志清（C.T.Hsia）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兩人在著作中皆已有了類似「五四文學」這個概念的雛型。後來捷克學者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更直接把五四運動當作新文學跟舊文學間的分水嶺。而以普實克為首，在當時並形成了所謂的捷克學派。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00-201。至1977年，美國學者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其著作中把「五四」作為斷代詞，成為了第一位將「五四文學」放入研究中的英語系西方學者。Merle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y Forth Era*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直至最近，西方學者賀麥曉（Michel Hockx）因不認同「五四文學」這個研究論述，而針對「五四文學」的研究成果做了詳細的整理，並提出有別於「五四文學」的觀點，這個以「五四文學」為出發點的研究趨向才逐漸受到挑戰。見賀麥曉（Michel Hockx），〈文學史斷代與知識生產——論「五四文學」〉，收錄於梅家玲主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頁157-171。

一、提倡傳播改革

文學革命形成一股風潮後，有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即：如何才能讓中國文學的得以徹底改革？這是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因舉凡傳統文字的用法、寫作的模式、民眾閱讀文字的習慣等，都歷經了長時間而變成所謂的正統。貿然提出新的方案，是很難被社會接受的。為此，在支持文學革命的知識份子中，已逐漸有人開始尋求解決之道。

新潮社成立後，對於該如何解決此一問題，部分社員也有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00-201。至1977年，美國學者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其著作中把「五四」作為斷代詞，成為了第一位將「五四文學」放入研究中的英語系西方學者。Merle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y Forth Era*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直至最近，西方學者賀麥曉（Michel Hockx）因不認同「五四文學」這個研究論述，而針對「五四文學」的研究成果做了詳細的整理，並提出有別於「五四文學」的觀點，這個以「五四文學」為出發點的研究趨向才逐漸受到挑戰。見賀麥曉（Michel Hockx），〈文學史斷代與知識生產——論「五四文學」〉，收錄於梅家玲主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頁157-171。

了自己的看法。而新潮社社員對於該問題的解決之道，似乎有一共同的方向。此方向即是推動大環境的風氣轉型。希望藉由當時中國大環境風氣的改變，讓文學革命的構想能逐漸被社會接受，並最終得以取代傳統文學。而傳播風氣的改革，就是「五四」前該社針對想改變的「大環境」所下的其中一種定義。

由於文學、戲劇、音樂等藝術創作，須經傳播管道才能表現出其價值。所以透過傳播界風氣上的革新，跟文學革命有關的相關文藝作品才能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當時一部分新潮社社員即著眼於此。換言之，他們認為傳播界風氣的改變，才是文學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而這些社員所認定的傳播方式，主要是放在報紙、雜誌、甚至於小說的生產類型，當時新潮社社員也把這視為是一種傳播管道。而社員之中，談改革傳播最力的人士，可以羅家倫作代表。

在新潮社成立前，羅家倫已於傳播界累積了不少的實務經驗。如前文所介紹，1918年間羅家倫曾協助《新青年》編輯群翻譯戲劇作品，同年7、8月間也擔任了《北京大學日刊》的特約通信記者。約在新潮社成立之際，他同時間還是北京《晨報》的一名特約編輯。所以，對當時中國傳播界的風氣，他算是頗為熟悉。因此，他在《新潮》1卷1號裡即發表兩篇文章，在文中提出改善當時傳播風氣的建言。兩篇針對的對象不同，一是針對既有的小說寫作風氣，另一個是針對報章雜誌而來。

首篇文章，是羅家倫因不滿當時中國在撰寫小說上的主流風氣，所以作了〈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一文來加以批判。文中先大肆抨擊了黑幕小說、艷情小說及筆記小說這三類中國主流小說體裁。而他形容當時黑幕小說是「罪孽最深……世上淫盜的事，誰不知道是不好的？何必著這類的小說來說一遍？」，而寫艷情小說者「祇會套來套去，做幾句濫調的四六，香豔的詩詞」。而談到筆記小說時，他將此類小說分成四個派別：一是言情類，跟艷情小說類似，只是「一個扯的長，一個縮的短」；二是神怪類，談神仙鬼怪的故事，只會讓人「都去發丹田泥丸宮的癡想」，或說「某處有艷狐，某處有情鬼」；三是技擊類，雖沒什麼害處但「在今日社會中有何等影響呢？」；四是軼事類，他認為「或許可以灌輸人民一點『掌故知識』，但做的人，大半都無學問；而且迷信『人治』附會大多於『法治』」。最後，他總結筆記小說時，認為「此派的小說，第一大毛病，是『無思想』」。⁹⁸

不單是批評中國文人的小說創作，對於當時國內的國外翻譯小說品質，羅家倫也指出了國內翻譯小說上的缺點。因此，他引了清末以來，從事翻譯小說上最具代表性的林紓為例子，並轉引了美國芮恩施批評林紓翻譯的問題的意見羅在評論中先引芮恩施所言「責備賢者」之語，來肯定林紓自清末以來透過

98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06-109。

翻譯帶給中國文化界的貢獻。只是，他同時也借用芮恩施的話，點出林紓的翻譯文學，一則不是西方當時的文壇主流作品，二是有很多的轉譯本，而二次翻譯的作品可能失去原著的本意。藉這種批評，來指出整個中國翻譯小說的缺點。⁹⁹

文末，羅家倫言中國人自己寫的小說，須掌握「不要『以聞之者足戒』的藉口，把人類的罪惡，寫的淋漓盡致。……所生的結果，只有壞，沒有好」、「不可荒誕無稽，一片胡思亂想，既不近情，又不合理」、「小說第一個責任是要改良社會，寫出『人類的天性』，……必須先研究社會學，再研究心理學；更從二學之所得；研究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人生哲學 Philosophy of Life」，及「多讀多看西洋的小說」這四個門徑。¹⁰⁰ 而中國翻譯文學也應掌握「選擇材料」、「需譯白話」、「若是自己不通西文，就請一位西文程度好一點的來同譯，……自己略通西文，也要仔細，萬不可懶察字典」，與「不可更改原來的意思，加入自己的意思」這四個關鍵點。¹⁰¹ 如此，羅家倫認為中國的小說界風氣才得以真正煥然一新。

第二篇文章，則是探討當時報界風氣缺失所寫成的〈今日

99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10-111。

100 以上四點，見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11-113。

101 上述四點，見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13-115。

中國之新聞界〉。對於中國的報界狀況，羅家倫他自認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對此，他還先於文章開頭解釋他本身的背景：

我也是曾經從事過新聞界的人，所以我知新聞界的內容很詳細；但是我雖曾新聞界中，卻又等於處在新聞界外，所以能以有第三者的眼光，說幾句『局外話』。¹⁰²

羅家倫企圖透過這段自我簡介，讓其文章更有說服力。而他的觀察中，認為當時中國報界存有幾個很大的缺點。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報界的新聞記者知識缺乏。他說除極少數有心向學的人士外，絕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者不是「斗方名士」、「末路官僚」，不然就是「墮落的青年」。也提到這些人學問底子不夠，造成編輯出來的新聞內容非常簡陋，以至於產生「紀事的眼光，非常之短」、「天天的職務，祇是抄襲盲從」這類問題。且報紙上記者針對時事所寫的社論，也因此幾乎每份報紙的社論「都是不痛不癢的調頭」。¹⁰³

該篇評論中，羅家倫還提到當時報界似乎無任何的「新聞道德」，他認為這是很壞的現象。他更具體說明了所謂的壞，提出「我國新聞界，是逢迎社會的，……社會不願意有世界眼

102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新聞界〉，《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17。

103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新聞界〉，《新潮》1卷1號，1919年1月，頁117-119。

光，記者也就不談國外的事情；……社會喜歡欺詐作惡，新聞記者就去搜輯許多小新聞，來作他們的參考」、「廣告雖不是記者所管，……也應該負點連帶責任纔是。我每每拿起一張報紙來，無論前面後面，常有『賣春藥』『醫梅毒』的廣告，『血肉模糊』一大片，西洋報紙中幾曾有這些怪現象呢？」這兩個他從觀察到的報紙內容，¹⁰⁴ 作為道德低下的具體實證。最後，他提出「『世界上還是報紙改良社會呢？還是社會改良報紙呢！』我望新聞記者想一想」的口號，希望報紙風氣要徹底改革，才能讓新聞界環境得以改變。

1 卷 4 號的《新潮》中，羅家倫再度發表〈今日中國之雜誌界〉一文，此文裡他仍抱持著類似的主張，持續呼籲傳播風氣的改革。文中並提出「有一定的宗旨」、「有知識上的聯合」、「多設週報」、「趨重批評」、「有統系的記事」、「略加諷刺畫」這六項，¹⁰⁵ 作為將來欲辦雜誌者應該遵循的方向。文末他並用《新潮》這份他參與編輯的雜誌為範本，以「有人問我道：『你專門批評人家辦的雜誌，你們自己辦的《新潮》怎樣呢？』我說：『我們在學生時代實在沒有能力辦雜誌；但是因為我們中國學問界裡太寂寞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勉為其難，……我們的志願，總想學一個西洋好一點的 Review，或

Monthly 而不辦一個中國式的雜誌』」作結，反映出他對《新潮》雜誌的信心，以及他認為中國雜誌界須跟西方主流出版界學習的觀點。¹⁰⁶

不論撰寫小說、編輯報紙或出版雜誌，從以上的整理，可知羅家倫在這三者的立論上都有一個共通點：即他把這些行為都當作傳播媒介，且認定透過改革傳播風氣和傳播內容，才能使中國文學風氣能真正改變，進而落實文學革命。而且，他所提的傳播風氣或具體方案，在中國當時的文化界裡根本不是主流，而他這種挑戰主流風氣的做法，正是體現了以多元化易一元化的精神，也是從文學革命中體現民主價值的作為。而當時持同立場的傅斯年，說法又比羅更直接和激烈。

傅斯年對於傳播的定義更為擴大，甚至把文學創作本身也是一種傳播方式來論。像他在《新潮》1 卷 2 號的〈破壞〉一文中，認為如新道德、新文學、新思想要在中國能以成為多數人所能接受的主流，其關鍵是在於「建設」與「破壞」兩種手段都要同時並行。他並將中國比喻為瓶子，拿瓶中水比喻成中國社會風氣，說：

假使是個渾水滿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渾水傾去，清水才能鑽進來。……中國提倡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處處與舊有

104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新聞界〉，《新潮》1 卷 1 號，1919 年 1 月，頁 121-122。

105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1 卷 4 號，1919 年 4 月，頁 629-632。

106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1 卷 4 號，1919 年 4 月，頁 632。

的衝突，……所以我們應當一方面從創造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著手，一方應當發表破壞舊有的主義，這是勢必處此的方法。¹⁰⁷

從以上的言詞中，可看出傅斯年的激進立場。他認為不論思潮、文學創作、乃至對道德觀點的見解，都應擺出全面和舊有制度宣戰的態勢。藉由挑戰所造成傳統價值觀的破壞，才能讓新的思維模式在當時中國找到立足點。即從當時傅斯年的想法裡，可看出他認為文學革命對舊有文學地位的衝擊，也可達到民主及多元性文化的目標。

此外，他在1卷3號《新潮》上發表的〈譯書感言〉一文中，也同樣帶有這方面的觀點。傅斯年將翻譯書籍視作一種傳播媒介，在文中他並針對翻譯範圍及譯書方法，提出他個人的改革觀點。¹⁰⁸ 而除批判主流的傳播風氣，《新潮》也積極介紹一些他們所肯定的報刊。¹⁰⁹ 這種作法，也多少帶有以這種方式影響讀者的閱讀偏好，進而改變傳播風氣現況的意圖。

107 傅斯年，〈破壞〉，《新潮》1卷2號，1919年2月，頁349。

108 傅斯年，〈譯書感言〉，《新潮》1卷3號，頁534-537。

109 例如在1卷2號及1卷3號的《新潮》中，新潮社社員還介紹了《新青年》、《每週評論》、《晨報》、《國民公報》等報刊，並皆強調這些是當世真正需要的刊物。

二、提倡教育體系改革

呼籲對當時教育體系進行變革，則是新潮社社員注意到的另一種大環境。這派的人士認為，當時中國的學校教育，特別是中小學教育裡的保守風氣，是發展文學革命時必須先解決的問題。因此，惟有先讓教育觀念改變，才能使文學革命的訴求得以順利推展。而葉聖陶的觀點可作為這派代表。

葉聖陶是最早注意到教育環境改革的新潮社社員。在《新潮》1卷1號中，他就與其友王鍾麒（非新潮社社員）聯名發表了〈對於小學教授作文之意見〉一文，針對當時小學教育傳統的作文教學觀念提出質疑。文章開頭葉聖陶便提到「處今日之時勢，小學生所需智識至多。若以『悠久之歲月』，而練習『不可限程收效』之作文，時非今世所應有之事」，並從選擇參考讀物、作文命題、行文通暢度、標點分段這些細節來論作文教學的改革方法。¹¹⁰ 文末，更總結了他們對改革作文教學風氣應具備的方針，說：

筆者對於作文教授之意見以『順自然之趨勢，而適應學生之地位』為主旨。是故對於『讀物』：則『力避艱古，求近口說』。對於『命題』：則『隨順其推理之能力，而漸使改進』。對於『作法』：『則不拘程式，務求達意；祇須文字與情意脛

110 葉紹鈞、王鍾麒，〈對於小學教授作文之意見〉，《新潮》1卷1號，頁93-100。

合無間，即已畢事』。對於『批改』：則教者居客觀地位，『但詞意之修正，不為主張所毀損』。¹¹¹

從上可知葉聖陶、王鍾麒兩人，是把作文教學風氣改革視為發起教育改革時的重點項目之一。而他們所提出的改革詳細內容，很多也正與文學革命所提出的「白話文學」、「引進西學」等項目的精神相符合，所以也更容易透過這種教育改革來完成文學革命。

除此文外，葉聖陶在《新潮》1卷4號上，發表了〈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一文，此文對於教育界改革的呼籲，比〈對於小學教授作文之意見〉更直接且激烈。文章開頭先以栽培植物為例，把小學生比喻成種子，小學教師比喻成栽種植物的人，說：

良好的種植家，栽培他的植物，雖不能增加植物的可能性，卻能漸漸改良那不良的遺傳性和環境。不良的種植家，非但不能改良遺傳性和環境，反而阻遏可能性；那嗎植物就糟了。如今把植物比喻小學生，小學教師便是個種植家。栽培小學生，有效沒有效，只有他負責任。¹¹²

111 葉紹鈞、王鍾麒，〈對於小學教授作文之意見〉，《新潮》1卷1號，頁101。

112 葉紹鈞，〈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11。

這種譬喻，點明瞭小學老師在這個階段的教育過程裡應擔起的重任。而葉聖陶更進一步指出小學教育對於每個人的人格養成，及對未來人生有重要的影響，他說：

要什麼小學教育？原來人之所以可貴，並不在他既已為人，乃在他進而為更高尚的人。這一人所作所為，果是在進化歷程裏頭，便算是個有價值的人。那嗎那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當然是各個人必要的東西。可是這真實明確的人生觀，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認識到的。……須得在幼年的時候，認定個方向，自己縱沒什麼人生觀的名詞存在腦際，卻走一步，進一步，自然而然，不走到岔子路上去，……這幼年的時候，不就是做小學生的時候麼？替小學生定個方向，使他們對準了他，充分發展他們的可能性，不就是小學教育的力量麼？所以我們可以說：小學教育的價值，就在打定一輩小學生具有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¹¹³

由此可知，葉聖陶認為小學教育的重要，是因為這時期是培養人生觀的關鍵時期。而具備明確的人生觀，也是他認為當時每個人都必須要有的人格特質。所以，小學教師要如何培養學生有正確的人生觀，便成為他的主軸。他認為要教學生培養

113 葉紹鈞，〈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12。

健全且正確的人生觀，必須去除先入為主的傳統教育觀念。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小學教育觀念，都帶有「籠統」、「玄妙」、「不切人生」這三種色彩，使身在幼年時期的人，無法透過教育啟發他們的人生觀。因此，他從教學素材、教師素養、授課方式及教學內容幾個角度入手，去談改革現有小學教育思維的具體做法。¹¹⁴最後，他談到「現在有很多人，也受了和我同樣的感觸，覺得小學教育，若是因循下去，必將『非徒無異，而又害之』」，指出許多人已看出小學教育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然而，葉聖陶認為促成改革的關鍵還是在教師本身。所以他在文末呼籲教師必須自覺，小學教育的改革才有希望。¹¹⁵

從這兩篇文章中，可看出葉聖陶對教育環境改革的重視。並可了解他提倡教育改革的心態，是為了讓代表新派白話通俗文學得以普及，從而挑戰傳統文學的主流地位。這種對於把落實文學革命，著眼在推動教育環境改革上的做法，也是該社意圖從大環境改革著手，落實民主觀念的另一種方式。

114 葉紹鈞，〈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13-621。

115 葉紹鈞，〈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新潮》1卷4號，1919年4月，頁622。並載於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主編，《葉聖陶集》（11），頁8-24。

小 結

在周策縱先生的研究中，曾指出新潮社在思想上面，主要受到社會主義和民主觀念的影響。¹¹⁶筆者除引用他的看法外，更認為社會主義，只是他們闡述民主觀念上引用的思潮之一。而從本章裡，可看出「五四」以前，新潮社透過新文化運動表現出的民主觀念，主要落實於對政治、社會、和文學革命三個議題的探討上。而他們的主張也有其獨到之處。

例如，在政治議題上，可以看到新潮社的作為與立場，遠比同一時期的《新青年》，在「五四」前標榜不談政治的態度要來的積極。而他們所談的政治重點，又多著眼於較廣的制度面，所以在觀感上又比當時另一學生社團國民社要來的溫和。不過，從他們所談論的政治主題中，還是不難看出，他們藉由表達民族自決、縮減軍備的立場，道出對當時中國政治上所呈現出的不民主、軍閥政客專制思維的不滿。並試圖透過這種模式，來塑造出一股有利民主政治的氛圍。

而在社會改革的議題上，新潮社循著《新青年》部分編輯的模式，透過詩文創作和批評儒家制度在中國社會所呈現的絕對權威現象，來刺激社會出現多元的聲音。¹¹⁷不過，新潮社更

116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頁77。

117 像早期的知名學者林毓生，就認為這是一種民初人士藉著反傳統來追尋自由的方法。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

集中於家庭制度的批判，似乎想藉由批判儒家思維演變出的家庭觀念（如孝道、長幼有序、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觀念），來徹底崩解中國社會制度中的一元體制（儒家制度），從而藉此達到多元體系的社會。而對這部分的批判，似乎又更較《新青年》要來的明確且具體。

最後，從他們對於文學革命的相關言論中，可看出新潮社也希望透過文學革命，來挑戰傳統文學在文學場域中主流地位。並希望藉由這種方式，使代表一般大眾的白話文學，取得和傳統文學分庭抗禮的機會。為此，他們就藉由找尋使大環境風氣能確實改革的方法，塑造出有利於文學革命的環境。

而新潮社對政治、社會、和文學革命這三議題的探討，主要都在強調一種多元易一元的做法。而綜合他們所提的這種正確方式來看，此種方式，實乃體現了該社的核心關懷，就是為了當中所反映出的民主精神。

「五四」前新潮社的核心關懷（二）：科學

在「五四」前新潮社社員的各種言論裡，筆者以為，另一個他們想藉這些言論宣揚的核心價值就是科學精神。有關科學精神的呈現，率先提出這個觀念的人士，是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編輯群，胡適更是當中的代表。胡適引進了西方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等方法論，試圖藉此建立起一套能讓中國邁入現代化，且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精神和標準。⁰¹新潮社的社員，對於新文化運動裡所具備的科學精神內涵更是重視。他們為種下更多利於科學風氣在中國普及的「種子」，甚至花了比批判傳統還多的時間，廣尋所有西方與科學有關的理論。因而讓新文化運動提倡者前輩的魯迅，還不免抱怨了這

01 這裡引了余英時先生的論點。余英時認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所提的方法論，就是為了想化約科學概念，便於當時人們接受，藉以使科學精神變的更有說服力和吸引力。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頁49-54。

的前途》，《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頁190-195。